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荒事件，造成了百万千万人的死亡，二十世纪最严重的两次饥荒都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这一相关性背后可能反映出来的某些特质，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但在本书之前，笔者未曾找到任何对苏联和中国饥荒问题展开比较研究的著作，本书补上了这一缺憾，同时作者文浩（Felix Wemheuer）在写作中广泛征引相关文献、研究，让读者得以对学界关于二十世纪饥荒问题的了解有所认识。

本书在“饥荒政治”这一母题下，谈论、分析了很多的内容，接下来根据作者的写作次序，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比较研究。作者首先指出，在共产党执政之前的沙俄和晚清民国，都应当被视为长期经历饥荒事件的“饥饿之国”，也就是说，共产党继承了承重的历史负担。因此，作者似乎认为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减轻对共产党的道德指责。但是，我们还需要同时考量以下事实：共产党时代的大饥荒发生于和平而非战争时期，其严重程度要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次单独的饥荒。如此，则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饥荒就更应该被归咎于执政者的错误而非历史的承重遗产。而如果能够对二十世纪以前同样是“饥荒国家”的地区（尚不清楚有哪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在和平年代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饥荒（这一点是确切的）进行考察，这一价值判断将更会令人接受。

接着作者比较了苏联1931-1933年饥荒和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相似性，发现这两个饥荒都与激进的集体化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有关联。政府农业、经济政策的不当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大幅度缩减，而非官方所归咎的自然灾害。但这饥荒所导致的后果，则由于以下两个互相关联的现象而严重恶化，最后产生了二十世纪灾荒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一是苏联和中国都在基本政策指定上，采取了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国家工业发展的办法（苏联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直截了当的说这是通过剥削农民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中国领导人虽未公开这么说，但毛也继承了斯大林农民应作“贡献”的看法），农民被安排在国家粮食配给制度末尾的位置，仅仅高于劳改犯的地位。其次，共产党国家对于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从农民那里强力征收粮食，以致于粮食的生产者甚至无法留够自己的口粮。两个国家还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保持粮食的出口以换取外汇，全然不顾自己国家人民的死活。最不可解释的问题是，为何中国未能够吸取苏联的教训，而且其后果更加严重。

第二部分是作者根据《内部参考》、中共中央决定、报刊文章和新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披露出的材料做的案例分析，作者是以时间的顺序再一次回顾了毛时代的饥荒事件。但由于这一结构划分是根据史料而非内容作的，因此于本书的第一部分有所重合，行文上有所重复。或许更好的安排是，分两个部分分别论述中苏的大饥荒，再在之后作比较的分析，这至少在行文上不会有重复的混乱。通过这一部分的案例，读者几乎不能不直观地感受到，斯大林和毛时代的政府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作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人”来看待。作者所谈论的“饥荒的政治化”——饥荒问题成为谈论的禁忌，任何自保而与国家政策相冲突的行为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与列宁式政党、专制政府、独裁者的个性密切相关。

在第三部分，作者将关注点放到了饥荒下的边缘地区：苏联的乌克兰和中国西藏。作者分析了饥荒如何影响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那些反对中央政府的谋求独立者或是追求建构民族主义神话的人们利用饥荒的叙事以到达自己的目的，但其往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曲解。

总的来说，本书的作者尽可能站在客观的、非先入为主的否定立场上看待中苏的饥荒问题，但是，作者所提供的证据仍旧无法排除对共产党政府与饥荒之间的消极联系，其责任仍是摆在第一位的。本书的遗憾之处在于，作者对于饥荒的视野较为局限在中苏两国，有些时候为何没有发生与为何发生了同样重要。其次，作者关于为何大饥荒在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分析似还有许多未尽之处，包括领导者个人的影响，政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角度或还可深入。